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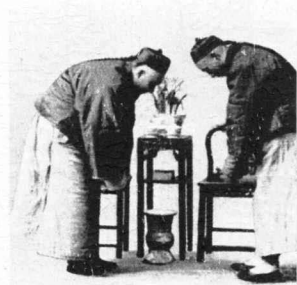
晚清思想史

◎ 郑天华 著

◆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晚清思想史



◎ 郑大华

著

◆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思想史 / 郑大华著.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11

ISBN 7-81081-551-2

I. 晚... II. 郑... III. 思想史—中国—清后期

IV. B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9488 号

晚清思想史

郑大华 著

◇责任编辑: 黄 林

◇责任校对: 全 健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 8853867 8872751 传真/0731. 8872636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国防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30

◇字数: 523 千字

◇版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书号: ISBN 7-81081-551-2/B·021

◇定价: 48.00 元

序

五十多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著作，经历了按时期依序论述思想家及其代表作到按主要思潮分类论述、由思想史或政治史到社会思潮史的变化。这种变化，表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发展和深化。但这也给我们提出问题：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社会思潮史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是相同还是不同？

郑大华教授在这部新著《晚清思想史》中提出了相同的问题：思想史的内容是什么？它与哲学史、文化史、学术史等有什么区别？他认为思想史与哲学史、文化史、学术史等应有不同，晚清思想史应以晚清中国人围绕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两大任务而提出的各种思想、观念和主张及其争论为主要研究内容，因此，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中通常所写人的哲学、文化和学术等内容，除与本书研究主题有关者外，一般不包括在内。大华的见解，他人未必都赞成，但提出问题来加以探讨，对于推进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当有益处。

大华在晚清思想史研究中作出的探索，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跨越了以 1840 年鸦片战争为晚清或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起点，把晚清思想史的逻辑起点确定在嘉道年间。这是“因为嘉道年间复兴的经世思潮使中国传统思想具备了向近代转型的可能性，而发生于此时的鸦片战争，又给经世思潮注入了新的内容，从而使这种可能性成为了现实性”。思想史与政治史关系密切，思想的发展变化无疑要受到政治的影响。但二者又有区别，思想的发展变化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因此，思想史的分期不一定等同于政治史的分期。

二、既重视思想家的思想，同时重视人民群众的思想，注重二者的互动关系。可以弥补以往的研究偏重于精英思想、忽视人民群众思想的不足。

三、不仅论析了思想家的言论主张，而且考察了他们的实践活动，把思想家的思想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这对于深化思想家的研究是必要的。

四、以思想家的思想来见证思潮的演化，又以思潮的演化来加深对思想

家思想的解剖，将思潮与思想家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系统著作中，以思想家及其代表作依序论述有其局限，不易见一代思想发展变化的脉络，如见木不见林；以思潮递嬗分类论述，可弥补其不足，但也有其缺失，不易见思想家的个性特点，如见林不见木。二者各有长短。任何体裁，都有其长短，如史书之纪传、编年、纪事本末诸体即是如此。将思潮与思想家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不失为一种尝试。

书中对目前晚清思想史或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争论较多的一些问题，如太平天国是推进还是延缓了中国近代化、冯桂芬的思想属性、救亡与启蒙的关系、改良与革命的评价、清末立宪的性质等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正确与否，可以讨论。尤其是全书最后总结了晚清留下的思想遗产：一是反对侵略的爱国思想；二是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三是“振兴中华”的使命感。很有意义。这三点，对于今人而言，仍值得珍视，加以继承和发扬。

龚书铎

2005年4月17日

目 录

绪论	(1)
一、晚清思想史的研究内容和逻辑起源	(2)
二、晚清思想史的演进轨迹及其特点	(6)
三、研究方法及应处理好的几对关系	(10)
四、清前期思想史的简要回顾	(14)
第一章 应对危机的经世思考	(19)
第一节 嘉道社会危机与经世思潮的复兴	(19)
一、嘉道之际的社会危机	(19)
二、经世思潮的复兴	(25)
第二节 鸦片战争与经世思潮的新发展	(45)
一、“开眼看世界”	(45)
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60)
第三节 嘉道经世思潮与晚清思想史的逻辑起源	(68)
第二章 太平天国的理想秩序	(70)
第一节 洪秀全与太平天国的发生	(70)
一、太平天国发生的社会原因	(70)
二、洪秀全对基督教的改造与利用	(72)
三、《天朝田亩制度》的“大同”理想	(77)
第二节 太平天国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批判及其两重性	(80)
一、洪秀全对封建政治思想的批判与继承	(80)
二、太平天国的反孔活动及其评价	(84)
三、太平天国反对偶像崇拜和对佛、道的批判及其局限性	(88)
第三节 太平天国与中国早期近代化	(90)

一、军事近代化的初步尝试	(90)
二、《资政新篇》的近代化蓝图	(94)
三、太平天国在中国早期近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97)
第三章 从洋务到早期维新	(102)
第一节 洋务思潮的兴起	(103)
一、统治集团权力结构的变化和西学初步传播	(103)
二、《校邠庐抗议》：从经世到洋务的桥梁	(107)
三、洋务官僚和洋务知识分子	(119)
第二节 洋务思潮的主要内容	(124)
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洋务派的“时局”观	(124)
二、“制洋器”“采西学”：洋务派的“自强”观	(130)
三、“必先富而后能强”：洋务派的“求富”观	(136)
第三节 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争论及其中西文化观	(140)
一、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争论	(140)
二、洋务派的中西文化观：“西学中源”	(144)
三、洋务派的中西文化观：“中体西用”	(149)
第四节 脱胎于洋务思潮的早期维新思潮	(154)
一、从洋务知识分子到早期维新派	(154)
二、早期维新思潮的主要内容	(157)
三、《新政真诠》：一部未得到应有重视的维新著作	(168)
第五节 甲午战争前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初步变化	(190)
第四章 救亡呼唤变法	(202)
第一节 维新变法思潮的兴起和发展	(202)
一、甲午战败与维新变法思潮的兴起	(202)
二、康有为的维新变法理论和活动	(206)
三、严复翻译《天演论》及其影响	(212)
四、维新变法思潮的蓬勃发展	(215)
第二节 维新变法思潮的主要内容	(223)
一、主张变法，反对守旧，要求“大变”“全变”	(223)
二、“兴民权”，“开民智”，实行君主立宪	(228)
三、宣传自由平等思想，抨击封建纲常名教	(234)
四、“富国养民”，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	(239)
第三节 维新变法思潮从高涨到低落	(244)

一、维新变法引起的新旧思想斗争	(244)
二、民族危机推动维新变法思潮走向高涨	(250)
三、变法运动失败, 维新变法思潮走向低落	(254)
四、维新变法思潮的性质和意义	(259)
第五章 空前的思想启蒙	(265)
第一节 戊戌后维新思想家的启蒙活动与思想	(265)
一、维新思想家的启蒙活动	(265)
二、梁启超的“新民说”	(271)
三、康有为的“大同”世界	(277)
四、“严译名著”及其影响	(286)
第二节 学术启蒙的思想意义	(294)
一、“史界革命”及其成就	(294)
二、文学“三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	(300)
三、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及影响	(308)
第三节 20 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启蒙思想	(312)
一、批判专制制度, 要求人权、平等与自由	(312)
二、批判纲常名教, 提倡伦理道德革命	(317)
三、批判“奴隶根性”, 提倡“国民意识”	(325)
四、破除封建迷信, 重视科学教育	(329)
第六章 民主革命与君主立宪思潮的兴衰	(336)
第一节 民主革命思潮的兴起	(336)
一、新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和民主学说的传播	(336)
二、孙中山早年的革命思想与活动	(341)
三、改良思想与革命思想的消长	(347)
四、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	(356)
第二节 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及革命派内部的思想派别	(364)
一、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思想论战	(364)
二、国粹派与国粹主义思潮的兴起	(379)
三、无政府主义派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泛滥	(393)
第三节 君主立宪思潮从兴盛到衰落	(406)
一、君主立宪思潮的兴起和发展	(406)
二、立宪派与清政府的“立宪”之争	(410)
三、国会请愿失败: 君主立宪思潮的衰落	(419)

四、革命思潮的高涨和清王朝的覆亡	(423)
结语 晚清留下的思想遗产	(425)
一、反对侵略的爱国思想	(425)
二、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	(434)
三、“振兴中华”的使命感	(455)
附录一 征引文献和参考书目	(468)
附录二 书成后记	(472)

绪 论

柯林伍德在其名著《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曾提出一个重要的史学思想，即：“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他认为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自然只是现象，它的背后没有思想；而历史则不仅仅是现象，它的背后还有思想。比如，一场地震可以死掉多少万人，但地震只是自然现象，其中并无思想可言。一场战争也可以死掉多少万人，但战争并不仅仅是现象，它从头至尾还贯穿着人的思想，它是思想的行动，人们发动战争是受思想支配的。又比如，一个人由于自然原因死了，医生只需根据外部的现象就可以判断致死的原因，是死于疾病，还是死于意外事故。但是布鲁塔斯刺死了凯撒，史学家便不能仅止于断言凯撒是被布鲁塔斯刺死的，还必须追求这一事件背后的思想，包括布鲁塔斯本人的思想，布鲁塔斯为什么要刺杀凯撒，是其个人行为，还是受某一政治集团的指派？凯撒的死对当时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如此等等。所以就此而言，历史学家所研究的与其说是历史事实或现象，还不如说是历史事实或现象背后的思想活动。

我们可以对柯林伍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说法提出各种各样的批评，譬如说他过于夸大了思想的作用，而没有注意到思想背后的物质力量，但他对思想史在历史研究中之重要地位的强调，无疑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我们一般认为，历史研究的任务无非有两个方面或层次：一是回答历史“是什么”；二是回答历史“为什么”。换言之，第一个任务是还原历史，第二个任务是解释历史。或者说，第一个任务是描述历史现象，第二个任务是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相比较而言，第二个任务比第一个任务更重要，难度也更大一些。而这第二个任务，一般而言，属于思想史研究的范围。我们通常讲历史的继承性，照我的理解，所谓历史的继承性，主要也就是思想或文化的继承性。因为历史给我们留下的，一是文字的历史，亦即文字记载下来的历史，如我们的“二十五史”；二是观念的历史，亦即长期形成的一些思想观念，如我们传统的“三纲五常”、“忠孝仁义”；三是物化的历史，如中国的长城、故

宫，埃及的金字塔。无论哪一方面，能为人们所继承的，只能是蕴含其中的思想或文化，而非历史的本身。就是物化的历史，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思想或文化符号，或者说是思想或文化的象征。否则，物化的历史还有什么意义？！

柯林伍德强调了思想史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历史是一面镜子”。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今天、展望明天。而要更好地认识今天、展望明天，就必须首先认识昨天和前天。因为历史不是一个孤立的时空岛屿，而是一个用时间联系起来的多维空间系统，昨天是前天的延续，今天是昨天的发展，明天包含着前天、昨天和今天，是以往一切历史的沉积。没有前天和昨天，也就没有今天和明天。如果说中国古代史是中国前天的话，那么，中国近代史则是中国的昨天。关于中国近代史，学术界虽有不同的看法，但一般都把1840年到1949年这109年历史称之为中国近代史，因为这109年间的社会性质相同：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临的任務一样：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革命的性质一样：民族民主革命；革命的对象相同：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109年历史包括晚清（1840—1911年）和民国（1912—1949年）两个时期。顾名思义，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是中国近代思想的历史，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部分，晚清思想史研究的则是晚清时期思想的历史。它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的昨天意义重大。

一、晚清思想史的研究内容和逻辑起源

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是五四以后随着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而逐步形成的，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的历史虽然不短，但学术界却一直缺乏理论上的自觉，缺乏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自身的研究，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与范围，中国近代思想史与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近代学术史等其他晚清史分支学科以及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等其他专门思想史的联系与区别等等，都缺乏应有的讨论，学者们对思想史究竟应该写些什么，没有统一的认识，许多思想史著作写进了哲学史的内容，甚至以哲学史为主，学科界限混淆不清。胡适是用现代学术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开山人物，但他后来把自己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改名为《中国古代思想史》，显然他已经发觉，他的书还不能算是纯粹的哲学史。然而改称思想史，似乎也不太合适，因为其中又有许多哲学史的内容。另一个例子是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哲学史的内容所占篇幅相当不少。而侯外庐的《中国近代哲学史》却又大量地写进了思想史的内容。新中国成立

以来出版的一些“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在内容上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和“中国近代哲学史”著作也并无多大区别。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和西方用社会史的研究方法研究思想史之方法的输入，中国学术界也对思想史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诸问题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葛兆光提出思想史研究的是知识、思想与信仰，并据此写成两卷本的《中国思想史》。该书出版后引起学术界的较大反响，赞扬者有之，批评者也有之，但就书中所涉及的晚清部分来看，似乎不太成功，至少它没有给读者提供一个晚清思想史发展的清晰脉络，而且就学术分类来看，信仰、知识和思想不是同一层次或性质的问题，彼此不能相提并论。又有学者提出中国近代思想史是研究这一时期各种思想观念，尤其是社会政治思想新陈代谢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性。还有学者提出近代带有资本主义倾向和性质的思想、观念和主张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如此等等。笔者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是由中国近代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决定的。中国近代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一是民族独立，使中华民族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亦即后来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进步，实现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这既包括从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向近代的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变，也包括从传统的封建农业经济向近代的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转变，即所谓“近代化进程”。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相依相存，民族独立是实现社会进步的保障，而社会进步又有利于民族独立的实现。围绕这两大任务，中国近代不同时期的中国人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和势力的利益出发，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和主张，有时还展开激烈的争论甚至斗争。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就是各个不同时期的人们围绕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究竟提出了哪些思想、观念和主张，这些思想、观念和主张提出后对社会产生过哪些影响，以及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如果以不同时期的中国人围绕中国近代所面临的两大任务而提出的各种思想、观念和主张及其争论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中国近代思想史不仅自然而然地与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近代学术史等中国近代史的其他分支学科区别开来，而且也与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等其他分支学科再分支的专门思想史区别开来。因为“作为根源于人类社会实践的认识的辩证运动”，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主要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①中

① 冯契主编：《中国近代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

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主要是古今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即古今中西文化的碰撞、冲突与融合。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的主要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换与现代学术的建立。至于各项专门思想史，它们的研究内容是由它们所属的分支学科（如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近代学术史、中国近代政治史、中国近代经济史等）的研究内容决定的，由于它们所属的分支学科的研究内容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不完全相同，它们的研究内容也就必然不完全等同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以上只是笔者一孔之见，正确与否，可以讨论。但我希望学术界对此应有高度的重视，因为只有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以及中国近代思想史与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近代学术史等其他晚清史分支学科的联系和区别，中国近代思想史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等其他专门思想史的联系与区别搞清楚了，才有可能进一步深化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

基于上述认识，本书以晚清不同时期的中国人围绕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这两大任务而提出的各种思想、观念和主张及其争论或斗争为主要研究内容，因此，其他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通常所写入的哲学史、文化史、学术史等内容，除与本书研究主题有关者外，一般不包括在本书的范围之内。本书也没有探讨人的信仰和知识问题。

除研究的内容外，晚清思想史或近代思想史的逻辑起源，也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如前所述，中国学术界一般都以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把此前的历史称之为古代史，此后的历史称之为近代史，也就是说 1840 年的鸦片战争成了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的分界线。与此相一致，1840 年的鸦片战争也成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逻辑起源，国内出版的几乎所有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包括近年来出版的几部有影响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都是从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写起的。最近有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外因决定论的历史观。在笔者看来，以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思想史或晚清思想史的逻辑起源的确有重新考量的余地。因为，第一，历史的发展，尤其是思想史的发展有其连续性，以某一重大事件为标志把它分为前后两个性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虽然便利了学者们的研究，但却割断了思想上的联系，使前一时期的思想成了无终之果，而后一时期的思想则成了无本之源，思想的连续性被人为地中断了。第二，以 1840 年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思想史或晚清思想史的逻辑起源，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的确具有外因决定论之嫌。这种观点只看到 1840 年鸦片战争引起的中国思想向近代的转

型，而没有进一步探讨西方挑战所以能引起中国思想向近代转型的原因，忽略了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内部所孕育的一些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尤其是经世思潮的复兴。如果没有这些新的思想因素，没有经世思潮的复兴对乾嘉考据学风束缚的突破，西方挑战引起的可能是另一类型的反应，即：不是中国思想向近代的转型，而是固守传统。实际上如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那样，1840年鸦片战争后，面对西方的挑战，中国思想界的反应是不同的，只有以林则徐、魏源、徐继畲、姚莹为代表的极少数具有经世思想的官员和士大夫，才作出“开眼看世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正确回应，而绝大多数官员和士大夫则是固守传统，拒绝接受西方思想文化的任何影响。第三，我们已经指出，中国近代思想史或晚清思想史研究的主要是近代或晚清中国人围绕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这两大任务而提出的各种思想、观念和主张及其争论，而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两大任务虽然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才正式提出来的，但追踪溯源，它们都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之前。众所周知，鸦片战争的起因是中国的禁烟，而中国所以禁烟，是由于英国大量向中国非法输入鸦片给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危害。对于这种危害，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以包世臣、林则徐、黄爵滋、龚自珍为代表的经世思想家和具有经世思想的官员就进行过揭露，也正是在他们的要求和推动下，中国的禁烟运动才开展得轰轰烈烈。至于社会进步，也早在鸦片战争之前，龚自珍、魏源、包世臣等人就对清王朝衰世下的种种黑暗现实进行过揭露和批判，提出过“更法”和改革主张，尤其是包世臣和魏源提出的漕运和盐法改革，已注意到商人的利益和作用，并提出过“农商并重”的新思想，在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洪仁玕提出《资政新篇》、冯桂芬写出《校邠庐抗议》之前，在这两个方面都还没有人能超越他们。

目前，在中国近代社会或思想发展的动力问题上学术界存在着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观点是外因决定论，这种观点虽不完全否认内因的作用，但认为中国社会或思想在进入清代以后，尤其是乾嘉以后已停滞不前，如果没有西方的挑战，中国社会或思想就不会产生任何新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变化；另一种观点是内因决定论，这种观点虽不完全否认外因的作用，但认为中国社会或思想本身具有追求近代性的因子，如果没有西方的挑战，中国也将沿着自身的发展轨迹，实现社会或思想的近代转型。对这两种观点笔者都不太赞成，笔者持的是一种合力论，即：中国近代社会或思想的发展既非外因决定的，也不是内因决定的，而是内因和外因共同决定的，在外因与内因之间很难分别出谁主谁次。因为历史已经证明：没有西方的挑战，中国的社会或

思想很难迈入近代的门槛；同样，如果没有中国社会内部本身所孕育的新的思想因素，对西方挑战的反应很可能就是另一种模样。就此而言，外因和内因，都是中国社会或思想实现近代转型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根据上述这些认识，本书跨越了作为近代政治史开端的 1840 年，用一定的篇幅考察了嘉道年间的社会危机，以及在社会危机的强烈刺激下的经世思潮的复兴，把晚清思想史的逻辑起源确定在整个嘉道年间。因为嘉道年间复兴的经世思潮使中国传统思想具备了向近代转型的可能性，而发生于此时的鸦片战争，又给经世思潮注入了新的内容，从而使这种可能性成为了现实性。正是在嘉道年间，中国传统思想开始迈出了向近代转型的第一步，并对晚清思想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晚清思想史的演进轨迹及其特点

晚清思想史的演进，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并在此轨迹的制约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研究思想史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把对思想史的长时段的宏观考察与对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的特征把握结合起来。大致说来，起源于嘉道年间的晚清思想史，经历过嘉道时期的经世思潮、太平天国时期的农民革命思潮、同光年间的洋务思潮和早期维新思潮、甲午战后的维新思潮、戊戌后到 20 世纪初的思想启蒙以及 20 世纪初的民主革命和立宪思潮这样一些发展阶段。这些思潮或思想运动的相继兴起，对晚清社会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在这么短的时期内，竟然出现过这么多对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思潮或思想运动，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很少看见的。

晚清众多思潮和思想运动的竞相出现，既是晚清社会急剧变化的产物，又是外部强大压力的结果，每一次抵抗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战争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大失败、大屈辱——具体表现为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都成了晚清思潮和思想运动产生的重要契机。如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南京条约》的签订，推动了嘉道经世思潮的发展；战后社会危机的进一步加深，构成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思潮兴起的历史背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北京条约》的签订，是洋务思潮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中法战争的失败和《中法新约》的签订，促成了早期维新思潮的形成；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导致了维新变法思潮的兴起；八国联军之役和《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清王朝已成了“洋人的朝廷”，民主革命思潮因此勃兴。而且随着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的一步步升级，以及造成的灾难和危害一次比一次沉重，晚清各种思潮和思想运动兴起和高涨的速率也越来

越快,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激进。10年前,乃至几年前的进步思想、思潮和思想运动,到10年后,乃至几年后就成了落后思想、思潮和思想运动了。如果借用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的话说,晚清思想史的发展“表现为急剧的新陈代谢,螺旋地推进,螺旋特别多”。^①这一方面体现了在外国列强的侵略下,先进的中国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希望早日实现国家的独立与富强的那种急迫心情;但另一方面,由于“新陈代谢”的速率太快,一种新的思想或救国救民的方案还未来得及认真地建构或实行,就已成了历史的落伍者,而被另一种新的思想或救国救民的方案所取代。这也是造成晚清乃至整个近代中国虽然涌现出了不少的思想家,但却没有产生像西方的培根、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那样的思想大师的重要原因。因为晚清乃至整个近代中国始终都面临着急迫的救亡任务,没有给思想家们充足的时间让他们从容地思考和建构他们的思想和理论体系。

对于近代或晚清的中国人而言,西方列强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明火执仗的强盗和侵略者,又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先进社会制度的代表者,他们在用坚船利炮侵略中国、用廉价商品掠夺中国、用基督教教义占领中国的同时,又带来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国固有文化的新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对于这种文化,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过惯了与世隔绝的生活、并且有着强烈的文化优越感的中国人,绝大多数是持拒斥态度的,只有少数先知先觉者在与西方的交往中才逐步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对于中国的积极意义,从而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1922年,正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凯歌猛进的时候,梁启超写了篇《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的文章,对这一历程作过总结。他写道:“古语说得好:‘学然后知不足。’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到同治年间借了外国兵来平内乱,于是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很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于这方面的事情,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像睡梦中著了一个霹雳,因想道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第二期所经过时间,比较的很长——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间

^① 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68页。

止。……这二十年间，都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①应该说，作为过来人，梁启超把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学习西方历程分为“三期”的总结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是物质上学习西方的时期；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及其失败，是制度上学习西方的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思想或文化上学习西方的时期。梁启超的这“三期”说，今天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和采纳。

当然，如有的学者已指出的那样，这“三期”的划分，仅就大致趋势而言，而不能作机械的、绝对化的理解，以为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人就是严格按照物质、制度、思想或文化这样的顺序一步步向西方学习的。实际上，在第一期，除物质上学习西方外，早在鸦片战争结束前后，魏源、徐继畲等经世思想家就对西方的政治制度表现出了羡慕之情；到了中法战争之后，早期维新思想家更是进一步提出了“君民共主”的要求。在第二期，维新变法期间，严复翻译介绍过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思想，维新思想家们宣传过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学说，批判过封建专制主义；戊戌政变后，流亡海外的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思想家积极投身思想启蒙活动，创办报刊，译介西书，传播启蒙思想，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中整理和探讨中国固有的旧学术，并提出了“史界革命”、“文学革命”、“小说界革命”和“诗界革命”等口号，他们和章太炎等革命派一道，推陈出新，在史学、文学、教育和白话文运动等多个领域取得丰厚成果，为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革命派在积极从事反清革命的过程中，也以饱满的热情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纲常名教和封建迷信，宣传资产阶级的人权、自由和平等思想，并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为20世纪初期的思想启蒙做出过重要贡献。第三期，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派在批判封建思想文化、提倡伦理道德革命的同时，也主张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和政治制度，并为此还和以杜亚泉、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进行过论战。文化虽然可以分为物质、制度、思想等不同的层面或层次，但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系统，一个整体，不能

^①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合集》第5册，文集之39，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3～45页。